



体育总局被迫“忍痛割爱”，足管中心撤编已成定局——

# 中国足球改革能否打造出“中国好足协”

本报记者 郭剑

“举例来说，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张剑是国家体育总局正司级干部，现在他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离开中国足协，国家体育总局为其安排工作，二是选择在中国足协任职（暂时失去正司级干部身份），其档案由国家体育总局封存。”国家体育总局相关工作人员在解读《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时告诉记者，“总局下了很大决心，做了很多工作，希望在体制改革层面‘破冰’，试验点就是足管中心，足管中心以前是行政化的代表，现在改革只留中国足协，不要足管中心，这是响应政府部门转变职能的切实做法。”

今天中午，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正式公布了《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以下简称《调整方案》），其中“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理顺中国足协与国务院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改革完善中国足协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完善中国足协财务资产管理”和“明确中国足协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有关权限”等几项关键表述，被外界视为“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足管中心”年内摘牌

“改革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指望中国足协明天就和体育总局撇清关系完全不现实。以今天这次会议为例，在‘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的描述中，‘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里面有一句话，‘实现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由事业单位向社团常设办事机构（中国足协秘书处）的转变，转变完成后，适时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并核销相关事业编制，其中‘适时’两个字是经过很长时间讨论才确定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最初“脱钩”方案中有“明年撤销足管中心”的表述，但相关专家经过摸底和调研后，认为“撤销足管中心”的时间点很难确定在今年年底，“可以肯定的是，明年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不在中央行政预算范围内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真正摘牌，也许很快，也许要等到年底，这要看接下来大家执行‘脱钩’方案的力度。”

以今年2月国务院正式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为依据，今天下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以及总局党组全部成员、17家参与足球改革部委相关人士、足管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和各地足球系统的代表，参加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刘鹏

在会上明确提出，“中国足协将与体育总局脱钩，中国足协依法独立运行，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

尽管此前足管中心工作人员并未见到《调整方案》全文，但大家对“保留中国足协，足管中心撤编”的说法并不陌生，而足球管理领域“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长期共存时代的结束，亦代表被球迷期待已久的“管办分离”，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十年顽疾等来对症下药

“管办分离”始于2004年，黑哨周伟新的明显错判逼迫北京国安罢赛，7家中超俱乐部由此发起“G7”倡议，要求足管中心“将联赛还给投资人”，但中国足协的“怀柔政策”，最终让俱乐部忍气吞声，中超公司于次年成立，开始承担部分联赛运营功能。中国足球界第一次认真考虑“管办分离”的可能性以及操作性，是在2011年，结果又一次无疾而终——2010年在中国足坛反腐扫黑后出任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韦迪上任之初志向远大，他希望在自己任期内完成“管办分离”方案，力促联赛健康发展，扭转国家队外战的糟糕形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韦迪多次在足管中心内部推行“管办分离”观念。2012年，韦迪甚至因“管办分离”进程极为缓慢，在足管中心内部会议上发了火。后据与会向记者透露，彼时“管办分离”无法推行的主要障碍，在于人事制度而非工作人员的态度，而“中超公司”全面接管联赛，已经可以算是“管办分离”的巨大成果。

“以后只有中国足协，没有足管中心，足协也要和总局‘脱钩’，这是改革的大势所趋。”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说，“对于‘脱钩’所涉及的职能划分、人事、财务、资产、外事等方面措施与政策，包括中国足协的五大自主权，我们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论证，并与国务院相关部门反复讨论，确保了《调整方案》的出台”——按照刘鹏局长的说法，国家体育总局希望将《调整方案》作为试验田，以此推动单项体育协会改革进程。

上世纪90年代末运动项目管理体制变革，中国逐渐形成体育总局项目管理中心与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共存”的特有体制，这一体制也随之成为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央巡视组向体育总局反馈巡视意见时明确指出，“总局

政、社、事、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形成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权和行业垄断权，管办不分，政事不分，政企不分，‘大政府、小社会’现象突出”，而这正是管理中心与协会共存的最大弊端。

目前，由体育总局主管的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有72个，其中奥运项目协会33个，总局以运作结构最为复杂、牵扯范围最为庞大的中国足球作为改革试验田，其难度不言而喻。

谁来打造“中国好足协”

更何况，这次中国足球是在国家队屡战屡败、自2002年后再也未能在世界杯舞台的背景下，再次成为改革试验田，其意义与1992年“红山口会议”大不相同——1992年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原八一足球队驻地）召开工作会议，确立了“中国足球”由专业体制向职业（半职业）体制转变”的改革方针，根据这一精神，中国足协在1994年推出甲级A组职业联赛，以俱乐部为主体的参赛形式彻底取代了以省市体工队为主体参赛的全国足球联赛，找到冠名赞助商后甲A联赛自此成为中国体育范畴内第一大职业联赛，尽管20年过去，中国足球在职业化道路上细节部分仍有极大欠缺，例如“服务意识”与成熟足球联赛相比差距巨大，但其“第一联赛”位置毋庸置疑，因此，“红山口会议”对于中国足球的推动作用，可以视为中国体育改革成功之作。

然而，“红山口会议”的前提，是当时中国足球界上下对于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从官员到教练再到队员对于“职业联赛”并不排斥，第一年联赛结束，教练、球员年收入数倍翻番的丰收景象，更奠定了“职业俱乐部”发展的基础——从这一角度分析，今天下午助推“管办分离”的“脱钩”动员会，其实质意义并非非体育界主动所为，而是在国务院高压态势之下给出改革方案，因此有中国足协工作人员（非国家体育总局事业编制身份）表态“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在国家体育总局层面，“足管中心”撤编是推动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与项目协会剥离的标志性事件（奥运争光项目不在此列，足球属试点特例），但在不少球迷看来，“足管中心”撤编并不能满足他们对中国足球的期盼。在一家专业足球网站的讨论区，球迷讨论的焦点是“中国足协谁来当家做主”，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应当由足球专业人士担当此任”，“原来的足管中心领导现在一下子



8月17日，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依法独立运行，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 CFP供图

都变成中国足协领导了，没过几年这些领导可能又要跳槽，这是体育总局改革，不像是中国足球改革，我很难相信同样一批人离开体育总局就能管好足球”，网友小歌的评论得到大批“点赞”——事实上，大多数球迷并不在意“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抑或是“中国足协”来管理中国足球，他们只关心“谁能管好中国足球”。

“按照时间表，今年年底中国足协要召

开代表大会，大会的一项议题就是改选足协的领导机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当然愿意参加选举（竞选中国足协主席）。”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说，“不过，即使是参加竞选，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被选上，但中国足球已经迈出了改革路上实质性的一步，我相信，每个人都为中国足球更好的发展做些实事。”

本报北京8月17日电

体育是体现孩子纯真最好的素材——

# 一名85后体育老师镜头里的体育课

本报记者 梁璇

小学体育老师，并不是1987年出生的张煜理想的工作。可最近，他却因一组小学生在体育课上和校园里尽展纯真的照片，

成为风靡微信朋友圈的“最会摄影的小学体育老师”。

在照片明暗交替的光线里，堆高了的仰卧起坐的绿色垫子、操场上湿润的红色泥土、跑道上泛着细微波纹的水洼、裂了缝

的水泥球场以及瓷砖线在折射下变得蜿蜒扭曲的蓝色游泳池，都成为映衬孩子的笑脸、腾空的身影、不合身的运动服和偶尔“开小差”的背景。体育课在被定格的一瞬间显得熟悉而生动，但对拍摄这些画面的张煜来说，更鲜活的是孩子在体育课上表现出的快乐与童真，这常常让他想起儿时的伙伴、奔跑的村道和乡间小路和大家一起抓过小鱼的溪流，“看到孩子们就想起自己的童年，这也是一种乡愁吧。”

然而，在一开始，对于给小学生当体育老师，张煜的内心是拒绝的。

2011年，来自浙江的张煜从西安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毕业，一直痴迷于短跑的他，希望能成为一名高中体育教师，“最好能带理想考体育类专业的学生训练”，在他的蓝图里，曾经看着波尔特的视频、对着镜子疯狂练习摆臂的日子，虽然没能让他登上最专业的赛道，但还是有希望去影响或改变别人与跑道的关系。然而，几经周折，他最终被分配到一群“喊集合都喊不齐”的小学生堆里，竞技训练的心得，几乎毫无用武之地。

“立正3分钟都难。”浙江衢州市新华

小学，张煜面对50多个二三年级的孩子，“角色有些没转变过来”，他对小学生好动、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特点几乎没有任何准备，便采取了十分严格的态度去完成体育课，“当时一意孤行，一定要纪律好才能上课。”结果两周下来，有家长去问校长反映“这个体育老师怎么上课和军训一样严肃？！”不少学生见到他，常常扭头就跑，他们觉得这个老是“没有笑脸，感觉有些怕。”

当成就感与他渐行渐远的时候，一个资深教师的话对张煜起了作用：“你很像教练员在上课，但小学生不是运动员。”

第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张煜决定向学生道歉，这一举动让很多女生湿了眼眶，从此，主动和张煜打招呼的学生慢慢多了起来，但最重要的是，张煜意识到“小学体育老师，要把课上得很精彩并不现实，但我要尽量让他们开心，积极主动地去完成一堂课”。跳绳、带学生做游戏，张煜尽量减少课标给学生带来的压力，“学生已经为文化课考试忙得晕头转向了，希望在孩子唯一能玩儿的体育课上，不要有那么多测试和标准。”

去年7月，张煜攒够钱买了一部iPhone5s，从未学过摄影的他，却在手机小小的镜头后面发现了全新的世界。“课上和孩子们打成一片”的时候，张煜脑子里常会涌现出一些定格画面，有时他就静静地坐在旁边看学生嬉戏，然后去观察那些充满天真的细节。虽然常有拿起手机拍摄的冲动，但顾及到其他孩子的安全，张煜还是把想法留到课后，请学生“重现”一些片段，或等别的老师上体育课时再去拍摄。

“二三年级是孩子最萌、最愿意上课、最活泼的时期。我拍照的时候，孩子们都很乐意在我面前展示，需要摆拍的时候也很配合。所以抓拍、摆拍都是他们真实的一面。”在学操场的白墙前面，张煜举着手机后面常常围着一群学生，“有些孩子不好意思跟我说，我就主动问他‘等下帮你拍一张好不好？’”被问到的孩子有的不作答，可当上一个“模特”刚走开，他们便会马上出现在张煜的镜头里，眼神中有掩不住的羞涩和期待。

在张煜比较得意的照片里，有一个小男孩在树荫下闭着眼睛仰着头的画面，这张照片被人做成了巨幅海报，张煜把它送给了这个上一年级的“小主角”，“他拿到海报时的兴奋，让我很有成就感。”这组照片被推送后，张煜的微博粉丝从200多迅速涨到了两万多，但为人所知的是他附上的网名“张内咸”，“内咸”是鲁迅的《呐喊》少两个“口”。至于体育老师张煜，还在手机镜头的后面，继续记录着他的体育课。 本报北京8月17日电



一个女生在参加接力比赛。 张煜/摄

广东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动会首次合并举行引发争议——

# 普通学生参加体育系统运动会为何貌合神离

本报记者 慈鑫

第十四届广东省运会8月16日在湛江闭幕，由于此次广东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动会进行了合并，这使得体育系统、教育系统的综合性运动会实现了互通，在全国是个先例。然而，全国运动会多少年都没有解决的让学生群体单独组队参赛的问题，在广东省运会上能否得到解决，答案却无法让人过于乐观，因为有参赛单位说，此次广东省运会上出现的体育与教育携手是“貌合神离”。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毕业于都是三年一期，如果让中学生运动会的赛期顺应省运会的话，很可能出现一届学生从入学到毕业都无法参加一届省运会的情况。因此，省运会的赛期最终还是“迁就”了中学生运动会。”

但这样一来，使得已经习惯了以4年为备战周期的专业运动队感到极为不适。高敬萍表示，在宣布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动会合并，并进行赛期调整后，一些专业运动队提出了异议。不过，“以竞技体育带动学校体育的发展方向已经确定。”高敬萍表示，依照广东省贯彻执行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简称“中央7号文件”）的要求，广东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动会决定尝试进行合并改革。在高敬萍看来，毕竟，专业运动队的整体训练和竞技水平要高于普通学校的运动队，让学生运动员与专业运动员同场竞技，对学生运动员和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肯定有激励作用。

深圳代表队的吴冠奇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体育老师，在带着一群普通中学生参加此次省运会的过程中，他对学生们受到的

激励作用感受深刻，“能够与这么多高水平运动员在一个场地比赛，学生们都感到很开心。”

另外，从学校来说，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动会合并也可以给更多的普通中学生提供参赛机会，一名带队的体育老师向记者表示，“以前，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动会分开进行时，很可能出现同一拨学生既参加省运会又参加中学生运动会的情况，中学生运动会上真正留给普通学生的参赛机会十分有限。现在，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动会合并之后，那些拥有双重身份的体校生不可能同时参加两个组别的比赛了，省运会的学生组比赛让普通学生有了更多的亮相机会。这对于学校体育来说，是个好事。”

从体育部门的角度看，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动会的合并，也让青少年专业运动员获得了与同龄人更广泛的接触和学习机会。广东省运会从第12届开始取消了成年组比赛，这项广东省竞技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专属于青少年运动员的赛事，而这些青少年运动员的年龄

基本相当于中学生的年龄。由于专业运动员的培养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青少年专业运动员与社会接触的机会较少，与普通中学生相比，知识面、社会经验和视野都比较窄。高敬萍表示，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动会合并之后，对于青少年专业运动员来说，也是一次与同龄人相聚、交流、学习的好机会。

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的综合性运动会合二为一，被寄托了诸多美好愿望。不过，现实的矛盾依然不少。

一名参加本届广东省运会学校组比赛的带队老师向记者表示，“专业运动员住的是酒店，学生运动员住的却是学校宿舍，待遇差别十分明显。另外，只有田径、游泳等少数几项比赛是竞技组与学校组的运动员同场比赛、分组进行。其他比赛都是竞技组与学校组在不同的场地进行，也就是说，这些比赛上竞技组与学校组的运动员根本没有同场比赛的感觉，双方的交流也就无从谈起。”

一名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也向记者抱怨，教育部门之所以支持省中学生运动会与省运会合并，是希望学生赛事能够从体

育部门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毫无疑问，省运会无论是竞技水平、影响力还是经济实力都比省中学生运动会强很多，但两项运动会合并之后，学生群体的受益情况却可能让教育部门失望。

在高敬萍看来，广东省运会今后可能还会把广东省大学生运动会吸收进来，但在广东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许舒翔看来，下届广东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动会是否继续合并，还有待讨论。

有人把本届广东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动会的合并评价为“貌合神离”。高敬萍表示，确实有一些政策问题留待体育和教育部门来解决。

比如，省运会和省中学生运动会的筹办经费分别由财政拨款给体育和教育部门，经费的额度有较大差别，但依照现行的财政制度，不同政府部门的经费并不能随意流动。这也导致了由体育部门负担的专业运动员可以在省运会上住酒店，但由教育部门负担的学生运动员却只能住学校宿舍。此外，本届广东省运会上，只在少数比赛的专业技术人员与学校组的运动员同场竞技，这也说明了赛事的具体组织工作仍没有实现体育和教育部门的真正“合并”。然而，如何解决专业运动员与学生赛事从形式的合并到事实的合并，这不仅仅是广东省运会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专业运动体制和学校体育长久以来难以打破隔阂的问题。 本报北京8月17日电

力争让国歌在鸟巢响起——  
2015田径世锦赛  
中国军团人数创新高

本报记者 梁璇

81名运动员、34个比赛项目，“这是中国队在世锦赛上参赛人数和参赛项目数最多的一次。”2015田径世锦赛将于8月22日~30日在北京举行，今天下午，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冯树勇对媒体介绍了中国队的备战情况。

据冯树勇介绍，本届世锦赛将由来自207个国家和地区的1931名运动员参加47个项目的比赛。其中，中国田径队正式获得参赛资格的运动员有69人，其中男子30人，女子39人；而根据规则以及对东道主的照顾，中国队还有5名男子和7名女子运动员作为候补队员参赛。“过去参赛的也就是二十六七个项目，人数在50人左右。”冯树勇表示，虽然本届世锦赛，中国队在多个指标的数量上增加明显，但其实质仍需理性看待。

“中国队在参加的34个项目上的发展并不平衡。”冯树勇介绍，其中，男子20公里竞走、女子20公里竞走、女子铅球、女子链球、女子标枪、男子跳远、男子跳高和男子4×100米等项目，“在近两年创造了不错的成绩，具有一定竞争力，如果发挥好，可以期待取得奖牌。”而男子三级跳远、110米栏、女子三级跳、女子跳高、女子铁饼和女子撑杆跳等项目，则有可能会进入决赛或进入前八名；但更多的项目“进入决赛或者前八名很难，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给队员提供锻炼的机会。”尤其男子投掷和男子中长跑项目，仍是明显的短板。

但从今年苏炳添闯进百米10秒大关、刘虹打破女子20公里竞走世界纪录来看，中国田径队的表现还是备受期待。对此，冯树勇的态度比较保守，在他看来，“之前比赛中的成绩并不代表在特定大赛中也能有相应的表现。我们有的成绩的确引起了世界田坛的关注和肯定，但稳定性不够，毕竟钻石赛和挑战赛的竞争程度，与世锦赛和奥运会还有很大区别。”

此外，伤病和对手发挥的情况，对最终的成绩也有决定性影响。冯树勇透露，目前，包括苏炳添、李金哲、李玲和赵庆刚等多名主力队员，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伤病情况，“李金哲之前在大连的训练成果不错，但感冒以后有将近10天没有进行系统训练，其影响不可忽视；赵庆刚因肩部和手肘的伤病有近两年没能参加比赛，其状态很难估计。”但对对手的变化，或许是好消息，由于频频爆出兴奋剂丑闻，强大的俄罗斯竞走队，最终仅派出3名运动员参加男子50公里、20公里和女子20公里3项比赛，这使中国竞走队在本届世锦赛获胜的几率明显增大。

“但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竞走和女子投掷。”冯树勇表示，自2012年开始，田管中心专门成立了短跨跳项目部，“短跨跳项目部成立以来，这些项目取得了明显进步，虽然没有取得重要突破，但此次达标人数增加，稳定性也有了提升，希望能够实现突破。”对于中国田径队的具体目标，冯树勇表示，“总局和中心领导并没有提出明确要求”，只是2008年中国田径队在鸟巢未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尤其刘翔没比成，甚至让很多人不关注田径了。”因此，本届世锦赛，中国田径队期待在鸟巢弥补以往的遗憾，“希望能在鸟巢奏响国歌，升起国旗。” 本报北京8月17日电



8月17日，加特林领衔美国选手备战田径世锦赛。 CFP供图